

### III、研究通訊

# 關於國家在理論與方法論上 反省的可能性

裴元領\*

## § 1. 理論的：

讓我們想想兩本工具書《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和《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裡有關「國家」的定義：

- 最廣義地說，國家是指任何組織起來作為一個統一體同其他人打交道的自治人群。它是由一個最高權力指揮的領土單位，現今包括官員、國土、專門裝備起來以便有別於其他人的士兵、大使、國旗等等。……然而更具體地說，國家一詞是指十六世紀以來在歐洲發展起來的國內中央集權統治形式。……國家作為有組織的實體，其最顯著的特徵在於能自由和順利地制定和廢除法律。(Kenneth Minogue, in Kuper & Kuper ed., 1989: 754)
- 一種政治聯合的形式，十五世紀起開始緩慢而零散地出現，並表現出與其先行者——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國家的區別。……〔可以〕分析下列三種國家概念之間的區別：強權國家，法律國家，合法性國家。……還可以根據各種國家理論所反映的不同的社會和經濟經驗來加以歷史的分析：反映等級社會秩序的國家觀，反映個人主義社會秩序的國家觀，體現社會共同體的國家觀。……對國家一詞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仍然是困難的，因為它是一個有爭議的觀念，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等各家各派的觀點交織在一起。(Miller & Bogdanor ed., [1993]: 738-40)
- 「國家」一詞可以指一種歷史實體或一種哲學思想，一種人類共同體的

---

\* 本文作者係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曾任東吳大學等校講師。

持久形式或一種特定的當代現象。這些不同含義未必矛盾，但需要仔細加以區分。……最一般的用法也許是把「國家」等同於政治實體或政治共同體，這類實體和共同體以各種不同形式存在於整個歷史長河之中，其發展演變一直是歷史科學的中心話題。……任何把國家規定為永恆不變的實體或事物的定義，顯然同時也就把它的歷史變化過程降低為無實際意義的影子遊戲。因此，一個有效的定義應是根據實際活動，以不同方式形成的界說。國家作為普遍現象是一種行為或事業，歷史表明它是強加於人的必然。這種行為重複性特徵表現如下：首先，它建立或形成了人類與其佔有物之間的固定關係，或者說它創造了該詞最基本意義上的人們之間的統一體或社會。所以，國家的終結或完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其次，它預先設定了一個有序權力或統治形式，或人們之們命令與服從的關係。因此，儘管國家所建立的統一體或社會未必就是等級制，但也與之密切相關，最後，形成和維持國家的行為總是專有的和特殊的，這使它同那些根本不屬於這一共同體的其他行為區別開來。國家作為在人與事之間建立一種有序關係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獨特總體，只是表達了作為人類行為的國家的最基本特徵。它還指出了反映國家某一新方面的另一特徵。作為一種有目的的行為，它必然提出自身追求目標的正當性和在一定條件下所使用手段的正當性問題。……從這個角度看，國家不僅是一種強加於人們的必然，亦即一種人們無論如何不得不參與的活動形式，而且也是一個需要解決的恆久問題，亦即權利問題。……〔而在字源學上〕國家一詞是在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末逐漸演變為表示政治實體的一般概念。根據W. Mager的說法，該詞的主要根源看來是用以表以身份、權力、官職、收入或王者之尊的狀態和表示政體形式和憲政形式的狀況。(Ibid, 740-1)

從這些界說，我們可以再思考諸多理論上的發揮。例如從Franz Oppenheimer，「從來一切歷史都是國家的歷史」(Oppenheimer, 1986: 150)「國家是一個世界史的對象(ein universalgeschichtliches Objekt)」(Ibid, 2)「國家由其發生言之，由其本質言之，在其最初階段，完全是一個社會制度(eine gesellschaftliche Einrichtung)。即戰勝人群管轄戰敗人群，而預防內部叛亂及外部侵略。」(Ibid, 7)或說「『國家』是人類依政治手段而造成的一切關係之總稱。『社會』是人類依經濟手段而結合的一切關係之總稱。」(Ibid, 151)照Oppenheimer的看法，經濟手段會逐漸壓過政治手段，即社會將逐漸壓過國家（同書第六章）。Anthony Giddens的看法則相反：「所有的國家都包含臣屬於國家治理的各個社會

系統再生產的形勢之反省性監控。」(All states involve the reflexive monitoring of aspects of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social systems subject to their rule.) (Giddens, 1985: 17)或認為「國家可被界定為一個政治組織，它的統治是領土有序並能動員暴力手段去支持統治。」(Ibid, 20)這和Max Weber的定義「在某個固定疆域內肯定了自身對武力之正當使用的壟斷權力的人類共同體。」(Weber, 1985: 156)極為相近。Nobert Elias則強調「壟斷暴力」是「人類一種社會技術的發明」，同時國內的暴力壟斷與國際的暴力壟斷並不相隨。(Elias; in Keane ed., 1988: 179, 182)就到這裡，「武力」「權力」和「暴力」已紛紛躍出。用Michel Foucault的形容，「權力應該分布在能夠在任何地方運作的性質相同的電路中，應該保持連貫性，直至作用於社會體的最小粒子。」(Foucault, 1992: 78)不只如此，《規訓與懲罰》還認為「可以說，戰爭在戰略上是政治的延續。但是，不應忘記，『政治』作為防止國內動亂的基本手段，也曾被視為一種延續，即使不是被嚴格地視為戰爭的延續，也至少是被視為軍事模式的延續。」(Ibid, 166)因此犯人的懲罰、軍人的訓練就在國家的運作中匯合了：「一方面，法學家或哲學正從契約中尋找建設或重建社會共同體的原始模式，另一方面，士兵和紀律專家則在共同制定對肉體實行個別與集體強制的程序。」(Ibid, 167)這裡彷彿還震盪著Niccolo Machiavelli的回聲：「立國的基礎是完善的法律和精良的軍隊。」(Machiavelli, 1984: 58)

國家作為壟斷武力和暴力的組織，可以「溫和」行使（藉國內法和國際法），也可以「直接」行使（藉內戰或對外戰爭），更不用說直達每一具作為國民（或公民）的肉體；而如果國家對外有它的軍隊，則對內就有它的警察。Brian Chapman言簡意賅指出「現代警察國家中警察組織的弱點，源於它權力的真正本質牽涉到政治。」(Chapman, 1978: 104)換言之，沒有所謂中立的警察，只有國家的警察，受政治權力影響的警察，而警局、法院和監獄就構成現代國家中控制身體與身份不可或缺的政治組織。

此外，David Held告訴我們研究現代國家形成時，至少要把兩個現象關連起來：即政治與社會團體以及階級的結構，還有國與國之的關係。(Held, in Hall & Gieben ed., 1992: 103)但這話說來輕鬆，做來可就不那麼輕鬆了。也許

在一些導論過後(Carnoy, 1984; Badie & Birnbaum, 1983)我們還得再理解(特別是西方)歷史中的國家(Hall ed., 1986; Anderson, 1974)並配合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理解(如Wallerstein, 1979);然後再參照對國家理論較全面的反省,如Ralph Miliband (1983, 1969) Nicos Poulantzas (1978)或者Bob Jessop (1982) David Held (1989) Bill Jordan (1985) Fred Block (1987)等人;或是針對正當性問題的Jurgen Habermas (1975, 1979: 178-205);直取解組化的資本主義同時討論福利國家的矛盾的Claus Offe (1985, 1984);有關菁英與統治階級的研究(Pareto, 1991; Mosca, 1939; Bottomore, 1991);有關權力與霸權的討論(Galbraith, 1992; Wartenberg, 1990; Laclau & Mouffe, 1985);或就民主(與獨裁)發揮的Norberto Bobbio (1989, 1987);談正當性但側重政治矛盾(Wolfe, 1977)或主攻國家機器(Clark & Dear, 1984);或就危機理論談資本主義發展與福利國家的重構(Gottdiener & Komninos, ed., 1989);或就系統理論來談國家,像David Easton (1989)和Niklas Luhmann (1990a, 1990b: 165-174);或就相對於「國家」的「市民社會(公民社會)」去引申(Cohen & Arato, 1992;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4期, 1993);或就特定現實,如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安全(Buzan, 1991)、種族民族和階級的曖昧認同(Balibar & Wallerstein, 1991)、柴契爾主義(Jessop et al., 1988)或部份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的合集(Braungart & Braungart, 1990)。Barrington Moore (1987)和Theda Skocpol (1979)關於革命與社會變遷的論著,或者一些政治學者的看法(如Almond & Verba, 1989; Dahl, 1989; Huntington, 1988; Huntington & Nelson, 1989)都可供我們進一步思考變化中的國家。更近的是蘇俄解體(溪內謙, 1993)和歐洲共同體的浮現(Dahrendorf, 1993; De Ruyt, 1991),這逼人們盯緊媒體;而像Ernst Cassirer《國家的神話》(1988)或George H. Sabine《政治學說史》(1990)等舊作也仍可細讀。至於更多的典籍……就暫時擱置。

Antonio Gramsci在論及「政治要素」時曾說:「第一個要素就是確實存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領導者與被領導者。整個政治科學與政治藝術就是基於這個原始的和(在既定的一般條件下)不可化約的事實。」(Gramsci, 1971: 144)據《獄中札記》英文編譯者Q. Hoare和G. N. Smith的註譯,這裡「在既定的一般條件下」(given certain general conditions)指的是在階級社會的條件下。這可

參照黑格爾《歷史哲學》裡說「那麼，首先要考慮的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的區別……」(Ibid)假如葛蘭西注意到馬基維利的重要性，那麼黑格爾也注意到了(Cassirer 1988: 135-6)，更不用提巴烈圖(Vilfredo Pareto)，這位不只一次把「力量」(force)和「秩序」(order)並列的人。(Pareto, 1991: 61, 81)韋伯也提到「國家是一種以正當（這是說，被人視為正當）的武力為手段而存在的人支配人的關係。國家要存在，被支配者必須接受支配者聲稱具有的權威。」(Weber, 1985: 157)「統治者／被統治者」「支配者／被支配者」的關係就是力量（或武力）的關係—不管從葛蘭西或韋伯—這就是談論國家—政治的出發點。

這裡我們並非準備把一切政治化約為「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的階級公式。一方面是階級化(classification)，另一方面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必須在這兩者的結合—分散運動中思考「人支配人的關係」（韋伯語）。Nobert Elias在〈社會過程中的個體化〉（約作於一九四〇到五〇年代）文中曾說：「在這過程的路上，不只是人們實際上變得與他們的構造更加不同，而且個人也變得更加注意到這種不同。而且從一定的社會發展階段起，這些不同帶有一種特殊的價值。伴隨社會日漸增長的分化與個人不斷造成的個體化，這種一個人對其他所有人的差異性(differentness)就變成某種在社會價值尺度上特別標高的事物。」(Elias, 1991: 140)「換言之，社會發展朝向更高層次的個體化，則在它的成員裡就開啓了到實現(fulfilment)與不滿(dissatisfaction)之特別形式的道路，開啓了對個體而言快樂(happiness)與滿意(contentment)之特殊機會，以及正好是社會性不快(unhappiness)和失意(discomfort)之特殊形式的道路。」(Ibid, 129)關於分化和個體化，關於差異性以及差異化後的心理效果，我們既不能片面化約，也不必片面誇大。Nicos Poulantzas在〈論個體化〉(1978)的文章中是這麼講：「社會體(the social body)的個體化與私有化就建基在國家所運用的權力實踐與技術上面，而這在一個並相同的運動中，就把被區分的單子群統合起來並且把它們整個整編到制度性結構裡去。……因為國家界定它的形勢〔，〕因此，個體—私人對國家活動而言就不是一種根本的障礙，反之，卻是現代國家在貫穿個體—私人過程中所建構起來的空間(a space)：它變成一種不斷後

退的視域(an ever-receding horizon)，在這種程度上國家跑進來玩(comes into play)。個體—私人形成了一種由現代國家所構成的戰略區域之整合部份(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trategic field)，而現代國家就把這個部份固定為它權力的靶標(which fixes it as the target of its power)。簡言之，個體—私人只在國家中並透過國家才存在。」(Poulantzas, 1978: 72)「在資本主義下階級是『開放的』：這些階級就建基在介於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小資產階級與農村階級之間之個體化的施為者的分配與流通(the distribution and circulation of individualized agents)上面。這些開放的階級興起了一種前所未聞的國家角色：就是在各個階級當中分派—分配個體化的施為者。(that of apportioning-distributing individualized agents among the classes.)……透過個體化機制(the mechanisms of individualization)，資本主義的階級特殊性(specificity)早已追溯到國家的物質性(materiality)：在學校或軍隊中運用權力的技術（亦即常規化—個體化的規訓）就與在各階級中，訓練—分派—分配著施為者—一個人的這些制度的角色給共同實在化起來了。」(Ibid, 75)

在以上分析中，國家的分派—分配作用使得個體—私人成為可能，「國家在各個階級中分派—分配個體化的施為者」，其重點就在於「國家界定它的形勢」(The State defines its contours.)這句話。換言之，國家界定有關於國家的論述(the discourses of state)，國家自身就是國家的存在理由(raison detre)、國家理性和國家活動（行動或行爲）。國家不能「從外部」界定，因為國家沒有外部；當然也不能「從內部」界定，因為沒有相對於內部的外部是無從想像的。現代國家使得「階級化」和「個體化」變為可辨識的過程，使得「階級」和「個體」變為權力的靶標、變為戰略區域之整合部份（部份！）、變為階級之間鬥爭和個體之間實現—不滿的運動、變為不斷分化和差異化的運動，總言之，使這些變為「可知的」、「可說的」、「可比較的」甚至是「可改變的」。國家是「開放的」（當然，這不是洞穴或箱子般的開放，也不是一張白紙任人寫或一片天空任人飛的意思），它在每一事物、每個人、每個字或每句話裡開放，就像「一」對「多」開放（見奧古斯汀《論自由意志》卷二第八章）——沒有純粹的「一」，但在任何數字中我們都可以找到

「一」。在這裡，國家而且是現代國家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和「自我反思」(self-reflexivity)就到達幾近「套套邏輯」(tautology)和「弔詭」(paradox)的地步，這便是國家的「自我描述」(self-description)。(藉魯曼對現代社會的分析，「社會的自我描述之各種描述面對著意識型態的對抗而非關於套套邏輯與弔詭之更根本問題的反省。」(Luhmann, 1990b: 128-9)〔原句作：Descriptions of societal self-descriptions face the antagonism of ideologies instead of reflecting upon the more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tautology and paradox.〕試把此處的「社會」改成「國家」思考之。)而關於「實現〔理解〕在自我指涉構成的過程中干擾的必要性，就解開了觀察對象以及同時觀察自身的弔詭。」(Luhmann, 1990b: 139.〔原句作：[R]ealizing the necessity of interruption in processes of self-referential constitution deparadoxizes the object of observation and—at the same time—the observation itself.〕)這句話中對於「干擾的必要性」的強調，對於「干擾(打斷、妨礙、插嘴)」(interruption)和「斷裂」(rupture)的思考，不僅有助於連繫(後)結構主義(阿杜塞、普蘭查、傅柯等)和系統理論(魯曼)的部份問題，也可以進一步在鋪天蓋地的「國家」問題裡推展。

詳細比較Elias (1991)、Poulantzas (1978: 63-75)和Luhmann (1990b: 107-122)有關「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的論點——如果再加上Foucault和Deleuze的話——當有助於思考「國家」，但筆者無意詳作註疏或片面強調這些論點的重要性；讓「階級化」和「個體化」相對且相關地運作才是重點。就像片面誇張「政治」或「經濟」、誇張「結構」(或「系統」)、誇張「歷史」(或所謂「現實」)，誇張自以為是的某種「角度」、「視野」或「切入點」，都已被自己的誇張而看不見其他事物時，我們也要避免被自己已知的意見給誇張起來而不自知。前引《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謂「一個有效的定義應是根據實際活動，以不同方式形成界說。」仍是我們不時引以為戒的警告。

即使是系統分析也告訴我們：「在政治系統而且特別在政治當中，正如在其他功能系統當中那樣，存在『對指導的需求』(a need for guidance)多於『對其他行動可能性的需求』(a need for other possibilities of action)。政客必須能夠說的比做的多。」(Luhmann, 1990a: 111)這句話能讓人們聯想的也許不只



是「多說少做」的經驗現象，包括更多「不說就做」、「做完再說」、「這樣說那樣做」、「隨便說隨便做」的技術也同時在運作中；而理論家不必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推論出來，更不必在理念中構想基本的、一貫的架構，否則至少對「政治」和「政客」就缺乏順手應對的彈性了。筆者認為研究者從不同的結合方式或組織方式出發，因而也伴隨著不同的矛盾形式或對抗形式，所以這裡也毋需變化出面面俱到的說詞。關於國家，既源遠流長又千頭萬緒，應對這「無盡的故事」需要的也許是靈活、謹慎和耐心，以及各式各樣的試探。我們可以一邊把「國家」想像成「政治系統的自我描述」(Luhmann, 1990b: 166)並主張「自我指涉是一種維持原則(a principle of maintenance)而非理性原則(a principle of rationality)」(Luhmann, 1990a: 95)，一邊思考理性化(rationalizing)和文明化(civilizing)，一邊觀察統治階級和國家官僚的手段，一邊回想它們的歷史背景。同時不妨想想「官僚無效率」(bureaucratic inefficiency)的理念型是否可能，並因此對所謂的法制型支配重新考慮。最後，我們可以從系統、結構等分析方式檢討它的特性。要讓論述（或話語）轉得動、接得起，則歷史—經驗—理論—經驗—歷史的循環運動就必須開始。爲了分析和陳述上的方便，我們時常聽到「要分爲不同的層次」、「這是不同的問題」諸如此類的勸告；但世界的發展是立體的（甚至比立體還複雜），同時表達猶恐以辭害義（畢竟文字不是立體的），分層之後就更不免各執一詞了。讓我們試著從點與點之間的關係轉變爲互賴性之間的關係(relations between interdependencies) (Luhmann, 1990a: 56)——亦即，一開始就是相互依賴的關係，再探討關係的關係(relations of relations)，如此一來，概念和現實的交互穿透和相互依賴才容易生動起來。國家可不是夠著供人研究的對象，那就不必太在意人們坐著寫些什麼，而站著又說些什麼了。

## § 2. 方法論的：

假如我們依照某些作者的分類，例如Robert R. Alford & Roger Friedland的「多元論」(The pluralist perspective)「管理論」(The managerial perspective)和

「階級論」(The class perspective) (Alford & Friedland, 1985)；或如Patrick Dunleavy & Brendan O'Leary的「多元論」(Pluralism)「新右派」(The new right)「菁英論」(Elite theory)「馬克思主義」(Marxism)「新多元論」(Neo-pluralism) (Dunleavy & O'Leary, 1987)；或如豬口孝考察近代國家的五種角度：「世界經濟」、「國際關係」、「階級關係」、「官僚制度」、「民主主義」(豬口孝, 1992: 61-70)—包括前面筆者提到幾本研究國家的論著—在研究上似乎告訴讀者若非儘可能整合既有的觀點，就片面強調某些觀點(如階級、資本、結構、系統等)，抽取意圖分析的部分而化約尚未分析的部份，以至於「儘量整合」時不免考驗每位作者的分類法能力，要不就是片面強調到缺乏自我設限的警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或系統理論不能對付的?!)。分類能力再優秀，終究是要拿小鞋小帽去套對象，如此理論的秩序才會清楚，而論文的架構才會嚴整；又因為片面強調的盛行(這位分析者也許還會加上「這是分析上的區分或抽象，並不等於現實。」等類似的但書)，所以這樣的強調無法在研究表達時同時自我修正並且接上不同甚至相反的論點。為了前後一貫，研究者可能把誰也不知道是否一貫的現實給一貫化，或把人盡皆知的事情理直氣壯地省略掉，以便於處理。

筆者要討論的無非是「在特殊時空下國家的某些現實搭配模式與概念邏輯模式」。進而言之，沒有「純粹的現實」，也沒有「純粹的概念」；在研究開始的地方只有「現實—概念」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concept)以及這種構成過程的銜接(articulations)與互賴(interdependencies)。在本文中，筆者所提「歷史—經驗—理論—經驗—歷史」的循環運動就是一種表達方式上的試探：從考古—歷史的資料進入歷史—經驗的討論，而這自然需要作理論上的反省，而且是與現狀相關的理論反省；此外，試著在不同的理論間尋找銜接的可能，正如在不同的現實間尋找互賴的關係那樣，看什麼樣的問題想什麼樣的辦法，不為「一致性」而犧牲「複雜性」。我們不準備整合一切現實與概念，只準備在討論問題時都儘量能找出諸多現實與概念之間的通路。「互動」與「溝通」已不再准許個別獨白的行動，這個方法論上的要求將在國家研究上取得它應有的地位。

## 參 考 書 目

裴文中等著

《考古學基礎》台北：帛書，1985。

張光直著

《考古學專題六講》台北：稻鄉，1988。

張光直著

《中國青銅時代》台北：聯經，1983。

張光直著

《中國青銅時代》（第2集）台北：聯經，1990。

馬承源主編

《中國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1988。

吳浩坤、潘悠著

《中國甲骨學史》上海：人民，1985。

黃展岳著

《中國古代的人牲人殉》北京：文物，1990。

孫淼著

《夏商史稿》北京：文物，1987。

杜正勝著

《周代城邦》台北：聯經，1979。

杜正勝著

《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1992。

虞雲國等編著

《中國文化史年表》上海：上海辭書，1990。

余英時著

「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收於氏著《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台北：聯經，1987。

楊聯陞著

《國史探微》台北：聯經，1983。

呂大吉主編

《宗教學通論》北京：中國社科，198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編纂組編

《中國歷代自然災害及歷代盛世農業政策資料》北京：農業，1988。

李文海、林敦奎等著

《近代中國災荒紀年》湖南：教育，1990。

瞿同祖著

《中國封建社會》台北：里仁，1984。

瞿同祖著

《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台北：里仁，1984。

陳顧遠著

《中國國際法溯源》台北：商務，1967。

陳顧遠著

《中國文化與中國法系》台北：三民，1969。

雷祿慶著

《中國法制史》（上、下）台北：東吳大學，1972。

錢大群、夏錦文著

《唐律與中國現行刑法比較論》江蘇：人民，1991。

楊鶴 主編

《中國法律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1988。

張宏生、谷春德主編

《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1990。

張晉藩、李鐵著

《中國行政法史》北京：中國法政大學，1991。

李鐵著

《中國文官制度》北京：中國法政大學，1989。

張晉藩、林中、王志剛著

《中國刑法史新論》北京：人民法院，1992。

張晉藩主編

《中國官制通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2。

李甲孚著

《中國監獄法制史》台北：商務，1984。

王永寬著

《中國古代酷刑》台北：雲龍，1991。

劉國新主編

《中國政治制度辭典》北京：中國社會，1990。

張德澤編著

《清代國家機關考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81。

朱建華主編

《中國近代政黨史》長春：吉林大學，1990。

全漢昇著

《中國經濟史論叢》（合訂本）香港：中文大學，1972。

烏廷玉著

《中國租佃關係通史》長春：吉林文史，1992。

賈秀岩、陸滿平著

《民國價格史》北京：中國物價，1992。

關夢覺主編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上海：人民，1988。

孫健著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90年代初）》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2。

孫文學主編

《中國近代財政史》大連：東北財經大學，1990。

高凱、熊光甲主編

《新中國的歷程（1949年10月1日-1989年10月1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1989]。

周雪光主編

《當代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台北：桂冠，1992。

李少民主編

《中國大陸的社會、政治、經濟》台北：桂冠，1992。

林長盛編

《解放軍的現狀與未來》台北：桂冠，1993。

王其坤主編

《中國軍事經濟史》北京：解放軍，1991。

劉旭著

《中國古代火炮史》上海：人民，1989。

張曉生、劉文彥編著

《中國古代戰爭通覽》（上、下）北京：長征，1988。

雷海宗著

《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台北：里仁，1984。

彭明敏著

《國際法概要》台北：三民，1966。

李國威著

《國際關係新論》台北：商務，1988。

蔡政文著

《核子時代國際關係的特質》（增訂二版）台北：三民，1978。

張五岳著

《分裂國家互動模式與統一政策之比較研究》台北：業強，1992。

田弘茂等著

《國防外交白皮書》台北：業強，1992。

國防部主編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國防報告書》台北：黎明，1992。

陳水扁、柯承亨著

《國防黑盒子與白皮書》台北：福爾摩沙基金會，1992。

莊金鋒主編

《海峽兩岸民間交流政策與法律》上海：社會科學院，1991。

龐建國著

《台灣經驗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幼獅，1993。

陳其南著

《公民國家意識與台灣政治發展》台北：允晨，1992。

許宗力等著

《地方自治之研究》台北：業強，1992。

黃世鑫著

《民主政治與國家預算》台北：業強，1990。

柯三吉著

《公共政策與政治經濟論叢》台北：時英，1991。

蕭全政著

《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1988。

邢慕寰著

《台灣經濟策論》台北：三民，1993。

吳若予著

《戰後台灣公營事業之政經分析》台北：業強，1992。

陳師孟等著

《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台北：澄社，1991。

張清溪編

《解析經濟壟斷》台北：前衛，1993。

林意楨編

《台灣的永續發展》台北：前衛，1993。

張景森著

《台灣的都市計劃（1895-1988）》台北：業強，1993。

葉啓政著

《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北：東大，1991。

蕭新煌等著

《解剖台灣經濟》台北：前衛，1992。

蕭新煌主編

《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1989。

蕭新煌編

《低度發展與發展》台北：巨流，1985。

吳大琨主編

《當代資本主義：結構、特徵、走向》上海：人民，1991。

黃仁宇著

《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台北：聯經，1991。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總第4期，1993年8月。

吳經熊著 黎登鑫譯

「中國法律與政治哲學」收於東海大學哲學系編譯《中國人的心靈》台北：聯經，1984。

吳經熊著 黎登鑫譯

「古中國與現代中國政治法律傳統中個人之地位」收錄同上。

大庭脩著 林劍鳴等譯

《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1991。

溪內謙著 柯文軍譯

《蘇維埃七十年》台北：商務，1993。

豬口孝著 劉黎兒譯

《國家與社會》台北：時報，1992。

Almond, Gabriel A. & Sidney Verba著 馬殿君等譯

《公民文化》浙江：人民，1989。

Althusser, Louis著 杜章智譯

《列寧和哲學》台北：遠流，1990。



- Aristotle 著 淦克超譯  
《政治學》台北：水牛，1990。
- Bottomore, Tom 著 尤衛軍譯  
《精英與社會》台北：南方，1991。
- Buchanan, James M. 著 吳良健等譯  
《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北京經濟學院，1988。
- Cassirer, Ernst 著 張國忠譯  
《國家的神話》浙江：人民，1988。
- Castells, Manuel 著 晏山樞等譯  
《經濟危機與美國社會》台北：唐山，1987。
- Chapman, Brian 等 朱堅章等譯  
《警察國家》台北：幼獅，1978。
- Cotterrell, Roger 著 結構群編譯  
《法律社會學導論》台北：結構群，1991。
- Dahl, Robert A. 著 張明貴譯  
《多元政治》台北：唐山，1989。
- Dahrendorf, Ralf 著 楊純譯  
《新歐洲四論》台北：商務，1993。
- De Ruyt, Jean 著 許連高譯  
《透視單一歐洲法案》台北：遠流，1991。
- Deyo, Frederic C. 著 李佳哲譯  
《亞洲四小龍的政經分析》台北：駱駝，1990。
- Duverger, Maurice 著 楊祖功、王大東譯  
《政治社會學》北京：華夏，1987。
- Easton, David 著 王浦劬等譯  
《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北京：華夏，1989。
- Fiske, John 著 陳正國等譯  
《瞭解庶民文化》台北：萬象，1993。

- Foucault, Michel 著 劉北成、楊遠嬰譯  
《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1992。
- Friedman, Milton 著 藍科正、黃美齡譯  
《資本主義與自由》台北：萬象，1993。
- Galbraith, John Kenneth 著 劉北成譯  
《權力的剖析》台北：時報，1992。
- Gilbert, Dennis & Joseph A. Kahl 著 彭華民等譯  
《美國階級結構》北京：中國社科，1992。
- Gompert, David C. 等著 鈕先鍾譯  
《核子武器與世界政治》台北：商務，1981。
- Gramsci, Antonio 著 譯者不詳  
《獄中札記》台北：谷風，1988。
- Huntington, Samuel P. 著 王冠華等譯  
《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聯，1989。
- Huntington, Smauel P. & Joan M. Nelson 著 汪曉壽等譯  
《難以抉擇》北京：華夏，1989。
- Jhering, Rudolf von 著 薩孟武譯  
「法律的鬥爭」收於薩孟武《孟武自選文集》台北：東大，1979。
- Kelsen Hans 著 雷崧生譯  
《法律與國家》台北：正中，1970。
- Kennedy, Paul 著 王保存等譯  
《世界強權的興衰（現代篇）》台北：風雲時代，1989。
- Kuper, Adam & Jessica Kuper 編  
《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上海：上海譯文，1989。
- Lenin, V.I. 著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  
《列寧選集》（4卷）河北：人民，1972。
- Machiavelli, Niccolo 著 何欣譯  
《君王論》台北：中華，1984。

- Mandel, Ernest著 馬清文譯  
《晚期資本主義》台北：谷風，1988。
- Marx, Karl & Frederick Engels著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1960。
- Marx, Karl & Frederick Engels著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4卷）北京：人民，1972。
- Marx, Karl & Frederick Engels著 李守庸編  
《馬克思恩格斯論重商主義以前的經濟思想》北京：文物，1990。
- Marx, Karl著 中共中央編譯局編譯  
《資本論》（3卷）北京：人民，1975。
- Miller, David & Vernon Bogdanor編 二書合編集體翻譯  
《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出版不詳〔1993〕。
- Moore, Barrington著 拓夫等譯  
《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北京：華夏，1987。
- Morgenthau, Hans J.著 張自學譯  
《國際政治學》台北：幼獅，1976。
- OECD編 梁向陽等譯  
《危機中的福利國家》北京：華夏，1990。
- Oppenheimer, Franz著 薩孟武譯  
《國家論》台北：東大，1977。
- Pareto, Vilfredo等著 劉北成、許虹編譯  
《菁英的興衰》台北：桂冠，1993。
- Petty, William著 陳冬野等譯  
《配第經濟著作選集》北京：商務，1983。
- Pound, Roscoe著 結構群編譯  
《法律史解釋》台北：結構群，1991。
- Sabine, George H.著 盛葵陽等譯  
《政治學說史》（上下）北京：商務，1990。

Stigler, George J.著 吳惠林等譯

《人民與國家》台北：遠流，1991。

Supple, Barry著 張秀容譯

「國家角色與工業革命(1700-1914)」收於Carlo M. Cipolla編，張彬村編譯  
《歐洲經濟史（工業革命篇）》台北：遠流，1989。

Thompson, James Westfall著 徐家玲等譯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北京：商務，1992。

Vico, Giambattista著 朱光潛譯

《新科學》（上下）台北：駱駝，1987。

Weber, Max著 錢永祥編譯

《學術與政治》台北：允晨，1985。

Weber, Max著 康樂編譯

《支配的類型》台北：允晨，1985。

Weber, Max著 康樂、簡惠美譯

《非正當性的支配——城市的類型學》台北：遠流，1993。

Зпатковская, Т. И.〔茲拉特科夫斯卡雅〕著 陳筠、沈澂譯

《歐洲文化的起源》北京：三聯，1984。

柯志明, Mark Selden著

「原始積累、平等與工業化」收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期，1988年  
春季號，頁11-51。

王振寰、方孝鼎著

「國家機器、勞工政策與勞工運動」收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3  
期，1992年11月，頁1-29。

王振寰著

「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式與政治轉型」收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4  
期，1993年3月，頁123-163。

吳泉源著

「金融自由化的迷思」收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5期，1993年11月，

頁1-37。

傅立葉著

「台灣社會保險制度的本質」收錄同上，頁39-64。

許倬雲著

「中國古代社會與國家之關係的變動」收於《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彙刊》第3卷第1期，1993年1月，頁1-15。

行政院主計處編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摘要：民國四十年至八十一年》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93。

自由時報

1993.05.25、三版。

1993.08.16、十三版。

1993.09.12、十三版。

1993.09.13、十三版。

1993.09.21、十三版。

中國時報

1993.10.07、社論。

Alford, Robert R. & Roger Friedland

Powers of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5.

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4.

Appelbaum, Richard P. & Jeffrey Henderson (ed.)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California: Sage, 1992.

Aristotle

Politics; in: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th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Badie, Bertrand & Pierre Birnbaum

The Sociology of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3.

Balibar, Etienne & Immanuel Wallerstein

Race, Nation, Class. London: Verso, 1991.

Block, Fred

Revising State The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87.

Bobbio, Norberto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ambridge: Polity, 1989.

Bobbio, Norberto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1987.

Bottomore, Tom (ed.)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Bourdieu, Pierre (et. al.)

“Introduction—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 in: The Craft of Sociology,  
edited by Beate Kraus.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1; pp.1-77.

Braungart, Richard G. & Margaret M. Braungart (ed.)

The Political Sociology of the State. London: JAI, 1990.

Buzan, Barry

People, States and Fea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2nd. edition)

Carnoy, Marti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Clark, Gordon L. & Michael Dear

State Apparatus. Boston: Allen & Unwin, 1984.

Clarke, Simon (ed.)

The State Debate. London: MacMillan, 1991.

Clastres, Pierre

Society Against the State. New York: Zone Boosk, 1987.

Choen, Jean L. &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Massachusetts: MIT, 1992.

Dunleavy, Patrick & Brendan O'Leary

Theories of the State. London: MacMillan, 1987.

Elias, Norbert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Edited by Michael Schrot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1.

Elias, Nobert

"Viol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John Keane. London: Verso, 1988; pp.177-198.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ume Two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1985.

Gottdiener, M. & Nicos Komninos (ed.)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Crisis Theory: Accumulation, Regulation and Spatial Restructuring. London: MacMillan, 1989.

Gramsci, Antonio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by Quintin Hoare & Geoffrey Nowell Smith.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Habermas, Jurgen

Legitimation Crisis. Boston: Beacon, 1975.

Habermas, Jurgen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1979.

Habermas, Jurgen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Massachusetts: MIT, 1992; pp.421-461.

Hall, John A. (ed.)

States in Histor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Held, David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Modern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89.

Held, David

“Central Perspectives on the Modern State” in: The Idea of the Modern State, edited by Gregor McLennan, David Held & Stuart Hall.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1984; pp.29-79.

Held, Davi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State” in: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edited by Stuart Hall & Bram Gieben. Cambridge: Polity, 1992; pp.71-125.

Held, David (et. al.) (ed.)

States and Societi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Ho, Samuel P.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60-1970.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78.

Jessop, Bob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2.

Jessop, Bob (et. al.)

Thatcherism. Cambridge: Polity, 1988.

Jordan, Bill

The State: Authority and Autonom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Kazancigil, Ali (ed.)

The State in Global Perspective. UNESCO, 1986.

Kristeva, Julia

Nations without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3.

Laclau, Ernesto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London: Verso, 1985.

Luard, Evan (ed.)

Basic Tex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MacMillan, 1992.

Luhmann, Niklas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lfare Stat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0a.



Luhmann, Niklas

Essays on Self-Refer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90b.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1. Middlesex: Penguin, 1976.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3. Middlesex: Penguin, 1981.

Miliband, Ralph

Class Power and State Power. London: Verso, 1983.

Miliband, Ralph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Mosca, Gaetano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Offe, Claus

Disorganized Capitalism. Edited by John Keane. Cambridge: Polity, 1985.

Offe, Claus

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 Edited by John Keane. Cambridge: MIT, 1984.

Offe, Claus

Industry and Inequality. New York: St. Martin, 1976.

Pareto, Vilfredo

The Rise and Fall of Elite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91.

Poggi, Gianfranco

The Stat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1990.

Poulantzas, Nicos

State, Power, Socialism. London: NLB, 1978.

Riskin, Carl

China's Political Econom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1987.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Crisis of the Tax State” in: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Richard Swedber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1; pp.99-140.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9.

Urry, John

The Anatomy of Capitalist Societies. New Jersey: Humanities, 1981.

Vico, Giambattista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4.

Wallerstein, Immanuel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3.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79.

Wartenberg, Thomas E.

The Forms of Pow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1990.

Wolfe, Alan

The Limits of Legitimacy. The Free Press, 1977.

後記：本文原題為「國家現實與國家概念的銜接與互賴——從歷史的、經驗的和理論的多重反省開始」，今節選原文之第三、四節刊登，請讀者注意。所附之參考書目為作者撰文時實際參考之資料，並未全部在行文中引用，特此說明。又，許多資料需隨時間進一步補充，以求對國家研究有更進一步的理解。